

# 广州起义败因新探

## ——以八七会议历史局限为逻辑起点\*

张 韩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在广州起义失败的多维成因中, 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八七会议的历史局限对广州起义产生很大的消极效应, 具体来说, 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革命策略的教条理解、革命力量的片面判断、革命情绪的盲目执狂等方面间接影响了广州起义领导层在革命时机把握、发动革命力量、组织战略退却、放弃冒险路线等方面的决策, 这也是我党早期对民主革命规律认识不足的真实缩影。

**关键词:** 广州起义; 失败原因; 八七会议; 历史局限

中图分类号: K2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8)02-0043-04

**作者简介:** 张 韩(1968-), 女, 湖南新邵人,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为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三次武装起义之一的广州起义, 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 它从实践上解答了在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的境遇下共产党人举什么旗帜、走什么路的历史难题, 其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历史辩证法内在的规定了早期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注定是曲折而艰辛的, 广州起义的失败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多年来, 学术界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研究颇丰, 基本认为广州起义在革命策略上缺乏灵活性和在指导思想上的盲目性是失败的主要成因, 而笔者拟从历史的维度剖析广州起义失败与八七会议局限的内在关联, 以求教各位专家同仁。

一、八七会议在制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正确革命路线的同时, 错误地估量了革命形势, 认为革命正处在“高潮中”, 直接导致广东省委在广

州起义决策时对起义时机的乐观估计, 而为起义的失败埋下伏笔。

基于科学合理估量阶级力量对比的革命形势判断是革命起义胜利的前提与基础, 而八七会议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无疑为广州起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八七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对大革命中我党所犯“右倾”错误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彻底的清算, 对在国共合作破裂的紧急关头如何继续开展民主革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正式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革命路线。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早期共产党自身经验的不足, 在反右的过程中没有很好的防左, 在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上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依然在“高涨中”, 因此在农民运动问题上认为“虽农民革命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 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提高的可能, 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避免的。”<sup>[1](P38)</sup> 在工人运动问题上认为: “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 以乡村

\* 收稿日期: 2007-12-22

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而在革命性质上则认为:“现在仍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但由民权革命的发展中而发展的阶级冲突仍未消灭。”<sup>[1](P167)</sup>这种判断显然是有悖于客观实际的,根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被杀害的达二万六千多人。革命事实上是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八七会议的失误估计在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展开,并呈现出理论形态的特征。会议指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在现今这种反动局面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终于重新爆发;如果对于这种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sup>[2](P336)</sup>认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发动广大工人、农民组织暴动以达到无间断革命之目的。这种“左倾”盲动主义思潮直接影响了广州起义领导层对起义时机的选择,参加八七会议的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张太雷就指出:“革命路程是不是通向高潮?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很有希望,而且通向高潮……十月十四日,广州海员在一个大运动中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他们占领了工会,痛打了工贼……武汉和湖南的农民也仍在斗争中。”<sup>[3](P37)</sup>随后广东省委的《通告第十四号——最近工作纲领》承袭了八七会议以来党中央对革命形势的高潮估计,指出:“中央及省委为什么决定广东暴动?这完全是根据于广东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与剧烈斗争,以及广东封建资产阶级之不能稳定而自行崩溃之实际状况……省委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暴动计划仍应该继续实现,现在的暴动还不应该停止,而应努力扩大。”<sup>[3](P40)</sup>由于在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的条件下就发动起义,因而失败也就成了逻辑发展的必然。

二、八七会议确定的“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工人暴动的革命策略教条地理解和照搬了苏联革命经验,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导致广州起义在占领广州时而未组织战略退却以保存实力。

正确的革命策略是实现革命利益与目的的重要途径与方法。毛泽东曾就革命策略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sup>[4](P1298)</sup>广州起义就是早期共产党人用苏维埃的形式对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探索过程,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思维直接来源于八七会议对如何贯彻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总路线的教条规定。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就指出:“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sup>[1](P43)</sup>这种照搬苏联革命经验的做法一方面是我党自身缺乏民主革命经验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源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教条指导。这种理论认识和革命实践的矛盾集中反映了在广州起义领导层革命策略的考量上,在广州起义的工作计划中就明确指出:“广州市工人应站在阶级利益上,自主的公开各地革命工会组织,召集产业的、职业的、地域的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制度之开始),开始一切斗争,实现各项要求,捣毁反动工会,杀死反动领袖,直到形成全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以夺取政权”<sup>[3](P54)</sup>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并以广州起义带动广东全省的工农暴动,这种设想就带有一省实现革命胜利然后带动全国革命形势的苏联经验的明显印记。正如叶剑英同志所说:“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南昌起义失败后,大革命失败的形势已经确定下来了,革命开始转入低潮。在此形势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是马上夺取反革命强大的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他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割据地”<sup>[5](P17)</sup>。

三、八七会议在革命力量的判断上片面强调党内“唯工人成分论”,而忽视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体的革命主体地位,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缺乏合理分析,因而在广州起义的过程中过分依赖工人的战斗力,而非有效地组织并实现农民运动与武装起义的有机结合。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具备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优点的同时,也存在三个显著的弱点即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不高、组织成分复杂、封建主义作风残余，这也是我党在早期出现“左倾”或者“右倾”错误的重要根源。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原因归结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因而在纯洁党的组织体系的过程中忽视中国社会特点，而过分强调了工人对革命的关键意义。八七会议一致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而肃清其中在最近几日表现机会主义的分子”<sup>[1](P46)</sup>；任弼时在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中也指出：“关于组织问题，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做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领导。”<sup>[1](P66)</sup>在这种党内“唯工人成分论”思潮的影响下，党内出现了认为革命主体是工人阶级，只有组织广大工人的大暴动而一省或者几省首先革命胜利的错误思想。广州起义就是贯彻这种革命思维的一次实践，广州起义领导人张太雷曾就起义的计划给中央信中写道：“广州工人必须起来保卫广州，以抗拒李济琛重入广州，建立其反动政权，同时反对张发奎，因为他与李济琛一样的反动。一方面广州工人只有自己起来夺取广州政权方有出路，一方面张、李两军阀血溅广州工人以机会。所以决定立即暴动。”<sup>[6](P34)</sup>虽然广州起义多次把农民暴动作为工人暴动的重要补充来看，并认为，“为要保卫广州之胜利，则须各地农民群众暴动起来，才有把握。特别是海陆丰暴动必须向惠州之南部平山、淡山发展，直趋广九路与东莞宝安之农民联合，以保护广州之暴动胜利”<sup>[6](P63)</sup>但依然没有跳出围绕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思维模式，也没提出具体武装农民的军事计划，还是强调依靠工人发动广州暴动，这在广东省委呈中央的起义准备报告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们的力量及其准备：我们决定发动广州之暴动，已详前函之报告，目前估计我们的力量，在工人群众方面，已经召集过各种代表大会，煽动他们起来总罢同盟工。作夺取政权之暴动，现在主要如海员、油业、手车夫等是有把握的……至武装方面，工人赤卫队已有三千之组织，发展仍是可，教导团差不多全数可以指挥，警卫团亦有二百余，工人赤卫队枪亦少。至于敌人军队里之宣传工作，仍做得不尚好。市郊农民方面。已派得力同志，如果广州暴动起来，是可以随着起来的”<sup>[3](P97)</sup>，并在苏维埃政府中明确规定“以工人九人，农民三人，兵士三人，党三人组织之。”<sup>[3](P98)</sup>可见广州起义在革命力量的判断上受八七会议来对

工人作用的过分强调的影响，而没有很好处理工人暴动与农民运动的结合，以苏维埃的形式进行工农武装割据，虽明确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相比八七会议是一个进步，但这种方式不能克服政权建设的长期性与反动革命势力客观上强大之间的矛盾。

四、八七会议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召开的，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尚未充分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的前提下在革命情绪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冒险性和盲目性，这种非理性的革命情感在广州起义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发挥，其后果是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以急躁冒进和盲目冒险为特征的非理性情感是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和理论准备不足的直接反映。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总结的：“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发展了”<sup>[7](P956)</sup>。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反“右”倾错误的同时，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集中体现在没有适时组织战略退却，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和命令无希望的地方起义。八七会议提出：“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sup>[1](P39)</sup>，“八七会议之后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以致发展为烧城市”<sup>[8](P17)</sup>，到了1927年11月召开的党中央扩大会议就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这对随后爆发的广州起义影响甚大，在广州起义的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革命情绪进一步发挥了，“铲除一切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残余势力”，“杀死一切压迫人的人”，在广州起义当晚，叶挺就提议，暴动后立即将部队拉到海陆丰，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但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固执认为只能以城市为中心，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是想去当“土匪”。在这一“左倾”盲动错误策略的指导下，革命队伍损失惨重，只撤出了少量部队到农村，失败教训是深刻的。

笔者认为，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广州起义期间用生命和鲜血所谱写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将永载史册，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财富。广州起义毕竟是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毕竟为此付出了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列宁曾经指

出：“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对最惨重的失败也能给以十分冷静的估计，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怎样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因此应当直言不讳，这一点，不仅从理论的真理来看，而且从实践的方面来看，都是重要而值得注意的。如果昨天的经验教训没有使我们看到旧方法的不正确，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学会用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任务。”<sup>[9](P71)</sup>但广州起义能第一次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并开展了以苏维埃方式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尝试，这是一个历史进步，但同时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革命策略的教条理解、革命力量的片面判断、革命情绪的盲目执狂等方面间接影响了广州起义领导层在革命时机把握、发动革命力量、组织战略退却、放弃冒险路线等方面的决策，这也是起义失败的历史成因一个重要方面。不能因为起义的失败而抹杀了广州起义的历史功绩，也不能因为广州起义的历史功绩而忽视深刻的历史教训，只有对广州起义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才是对广州起义最好的

纪念。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 八七会议[C].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 [2] 中央档案馆.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A].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C].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 [3]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广州起义资料：上[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广州起义资料：下[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6] 中央档案馆. 广州起义资料选辑[C].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 [7] 毛泽东.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A]. 毛泽东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9] 列宁. 论新经济政策[A]. 列宁全集：第3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责任编辑：高 辉)

## A New Exploration into the Failure of Guangzhou Uprise

—Taking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 of the August 7 Conference a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ZHANG H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many reasons for the failure of Guangzhou Uprise, one essential is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 of the August 7 Conference. To put it in detail, after the Great Revolution failed, the August 7 Conference mistakenly estimated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strategy, power, and mood, leading to the mistaken decisions in grasping the right time, organizing revolutionary power, organizing strategic withdraw, and giving up a risky policy. This is also a true miniature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o did no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es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his early years. Key

**words:** Guangzhou Uprise; reasons of the failure; the August 7 Conference; historical limitation